

不断深入的经济改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

武力 曲冠青

【摘要】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迄今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10次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实现了新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其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届三中全会尝试各种改革举措，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十四大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深化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二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后，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性、指导性会议。从大历史观来看，改革开放确实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关键词】三中全会；经济改革；不断深化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4)05-0004-9

从开启改革开放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如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10次三中全会。这10次三中全会所跨越的时期，既是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期。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具有显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主导型特征，那么这10次三中全会所包含的不断创新，以及所体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更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增强“四个自信”。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历届三中全会发挥了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走向深入的重要作用。

目前无论是从历史层面，或者是从实践层面，都到达一个需要对历届三中全会进行梳理和总结的时间点。从历史层面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曾经面临哪些困难，又如何通过历届三中全会克服了相应困难，值得进行思考和归纳。从实践层面看，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份里程碑式文件。因此，借助对历届三中全会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从大历史角度更好地学习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刻理解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蕴含的深远指导意义，从而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启示。由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不同时期的历届三中全会如何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走向深入，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三中全会：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意味着拉开了中国经济改

革的大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并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再到十三届三中全会针对党的十三大召开后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乱象局面，提出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为保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直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体现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大胆探索，又“摸着石头过河”，从思想上和实践上都突破了长期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解决了对于中国这个经济落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要理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及其重要意义，首先需要理解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具体原因，在此不详细展开^①。总体上，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即它保障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中国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能够很快建立起保障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和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作用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的高积累，新中国迅速建立起基本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近代中国屡受欺侮的直接原因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业发展水平低下。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了基本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下奠定的工业基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重要原因。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保障了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相应进行了医疗、教育、水利等各方面的基本社会建设。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十分有限，不过还是能够维持下去。中国人口从1949年底的5亿4千万人增长到1978年底的9亿6千万人可以说明这一点^②。这一时期的医疗、教育、科技、水利等社会建设也在推进。例如1949年中国每万人的医院床位数为1.48个，1978年提升至19.38个^③。最后，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中国国防尖端技术实现突破。如果没有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不可能完成“两弹一星”、核动力潜艇的研制；而如果没有相关国防尖端技术，中国必然会长期面临更大的国防、安全压力。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奠定的工业基础、社会基础和国防基础之上的。

在看到计划经济体制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经济体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计划经济体制最主要的弊端是僵化，表现在：一是计划经济带有明显的行政命令特点，难以达到科学、准确和及时的要求，更难以有效应对预料不到的变化，所以当时计划管理机构流传着“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计划赶不上变化”的说法。二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不仅农业主要是落后的传统农业，大多数现代工业的规模也很小，而且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产业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单一公有制在这种条件下“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很难适应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市场调节作用。这种僵化的体制导致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简单而言，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充分应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又无法有效调动个体的生产积极性——

^① 相关研究参见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曲冠青：《从“重点”到“优先”——新中国重工业发展战略的确立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2期。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③ 参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统计资料》，第210页。

计划经济体制的本意,是通过有序的经济运行加速推进经济建设,但在具体施行时,计划经济体制反而放大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摩擦,导致国民经济管理僵化、运行扭曲。在经济体制僵化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丰富的人力资源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人民生活水平自然得不到提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所下降。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拥有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解决了保障国家安全这个最紧迫的问题之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完成了历史使命,需要及时变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可惜这个改革被“文化大革命”阻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决策,提出解放思想和实行改革开放,顺应了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亟需改善;第三,国家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并且具备了对外开放的条件。因此,就经济发展规律和客观要求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顺应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实现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

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了新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为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积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开放也势在必行。不过,想要改革开放,不等于能够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需要满足相应条件。改革开放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首要贡献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改革开放。除思想路线外,改革开放还需要政治上、组织上的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恢复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同时让一大批老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只有在完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调整之后,全党的工作重点才能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今天眼光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并没有多少关于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包括“改革开放”这一表述,也是到1984年才正式提出的。但是从大历史观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新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特别是对改革开放而言,意味着“从0到1”的关键性突破。正如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开启了新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届三中全会一方面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改革的深化,另一方面也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质。

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充分肯定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把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城市、国有企业方面,同时推进商品经济和价格体系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四川、安徽等地已经尝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①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大,以珠三角地区为代表,各类三资企业发展迅速。农业问题的改善和三资企业的发展,凸显出城市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

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有企业已经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有企业承包制、租赁制在各地广泛试行,一些企业还尝试了股份制,同时国有企业内部也相应推行了厂长负责制等一系列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出“有计划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商品经济”，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的观念。此外，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使得物价、流通领域问题增多，加之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让计划价格体系成为后续经济改革的又一关键。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改革的深化，集中体现在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的重视和应对。

到1988年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之际，经济过热、物价涨幅过大成为国民经济领域最显著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十三届三中全会将经济改革重点确定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主要方法，是压缩社会总需求和整顿流通领域乱象^①。需要注意的是，十三届三中全会还提出“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和加强党的领导^②。可以说，十三届三中全会在继续解决改革开放的新问题的基础上，已经总体指明了改革开放的后续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但并不意味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是一帆风顺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届三中全会继续将中国经济改革推向深入，同时这一过程也产生了相应问题。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对症下药”，也可以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尽管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具有市场化的趋势，但总体上还是想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来弥补计划经济的缺陷和弊病。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将经济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和国有企业，主要改革举措是对国有企业施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承包制、租赁制。将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和国有企业，同时将在农业、农村改革中取得成功经验的承包制推广到国有企业改革，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深化经济改革的一种体现。承包制、租赁制迅速改善了相关企业的经营状况，然而工业生产复杂程度远超农业，承包制、租赁制虽然刺激了承包人、承租人的积极性，却没有解决产权层面的问题。在推行一段时间后，承包制和租赁制企业不仅出现了经营状况下滑的现象，甚至出现了承包人、承租人在合同期内滥用生产设备、竭泽而渔的情况。同时，在物价、流通领域，与计划经济相比，价格双轨制当然是经济改革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价格双轨制形成的价差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流通领域的混乱，成为“官倒”的腐败温床，引起人民群众不满。

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88年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举措是不断深化的，但相关举措在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又带来新问题。实际上，十三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设想，到20世纪90年代初，形势更加迫切，中国经济不单单需要各个领域的具体改革举措，如果中国希望延续改革开放，就必须把经济改革整体推进到综合性、全面性阶段，在新体制下系统、全面地解决问题。

经过1989年国内严重政治风波和国际上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加上国内对改革开放的疑虑，1989年、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4.1%和3.8%，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低的两年。这些都成为促使邓小平在1992年初发表著名“南方谈话”的因素。针对人们提出的中国改革开放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247页。

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

邓小平还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经济。他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③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继1978年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后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二、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落实这一目标是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除第一节外,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为9个方面,其中前6个方面和经济改革直接相关,包括: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④。后3个方面,即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虽然不完全属于经济领域,也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联系密切。

也许在文本中不容易辨别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在具体改革实践中更能体现出各个领域经济改革的交互与深化。

首先,既然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体系,就要尽可能取消计划对资源的配置。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权限,钢铁、煤炭等价格也相继并轨。1994年决定,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分房,培育、发展房地产市场。

其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对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方向,而后在1997年召开党的十五大后,国企改革全面铺开。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一方面塑造了一批今日的龙头国企,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在大量职工下岗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更不能缺位。除了出台米袋子、菜篮子等措施外,涵盖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社保体系开始建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阵痛后,大部分下岗职工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国有企业改革后,国家如何保持对国民经济的调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2~476页。

控能力？1994年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担政策性信贷业务；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独立制定、实施货币政策，不受地方各级政府干预；1995年还将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有专业银行改组为国有商业银行，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化解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在金融体系外，1993年国务院决定进行分税制改革，改善、增强了中央的财政力量。

随着1997年中国首次出现买方市场，在“短缺经济”消失、买方市场出现的条件下，一方面大部分国有企业出现亏损，遭遇经营困难；同时以轻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也面临市场饱和的压力，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有待调整。另一方面，随着小康目标的提前实现，总体上消费结构有待升级，温饱问题解决后，内需不足也是一个需要应对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与国企改革攻坚并重，作为经济发展短板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农业、农村、农民，再次成为经济改革关注的重点。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①。

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决定从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00年底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继续从多方面、向深层次进行改革攻坚。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国家采取了兼并破产、债权转股权、技术改造、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应该淘汰的淘汰，能够救活的救活，需要做大的做大，必须提高的必须提高。经过艰苦努力，基本实现了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的三年目标。

与此同时，1998年10月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重点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会议认为“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此外，中国还加快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步伐，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加快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上述各方面经济改革环环相扣，共同搭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如何通过改革使经济体制机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就成为党的十六大的重要任务。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2003年10月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除第一节外，将经济改革分为11个方面，在涵盖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9个方面、推动相关领域深化改革之外，专门另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完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改革”两节，具体说明相关改革^②。

十六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改革同样内容丰富，在此列举几个对国民经济带来深远影响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例子。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最具历史意义的改革是农业税费改革。2004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4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4~482页。

年中央决定五年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取消农业税。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还取消了一系列“三农”收费。农业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府职能逐步开始了由收取税费向提供公共服务的转变。

面对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一方面城乡差距扩大,仅靠取消农业税不能解决农业发展短板、农民收入增长过慢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阶段。因此中央决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①。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银行监管体制改革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地方国资委相继成立。国资委成立后,通过向国有企业派出董事、监事等形式,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参与到国有企业决策过程中,缓解了出资人不到位的问题。同在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银监会成立后,央行不再承担对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专注于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等职能。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共同构成我国金融系统的分业监管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扩大,并且通过降低关税、建立贸易关系等方式积极扩大进口,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无论是农业税的取消,还是国资委、银监会的成立,抑或是进口的扩大,都是对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深化改革举措。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其具体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过20年的发展,可以说中国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流畅的运转。

还需要留意的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似乎形成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双数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三中全会往往侧重于经济的总体改革,例如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二十届三中全会;而单数届三中全会则往往侧重于特定领域的具体改革——例如十三届三中全会侧重于经济治理整顿,十五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关注“三农”问题,十九届三中全会则侧重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党有关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改革重点的变化而持续深化、不断提高。

三、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已经尽善尽美,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且不竭动力,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永远在路上。面对国内经济“三期叠加”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的地位,指出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

^① 《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与之前历届三中全会相较，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有三个特点。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注重“五位一体”。《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有16节，相较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12节增添了4节，并且各节内容也有较大幅度调整、重组，其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没有深入涉及的领域^①。其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方面，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为“决定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新突破。最后，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后续经济改革和全面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它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在消除整体性贫困、淘汰落后产能、国有企业重组、金融监管、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限于篇幅，本文仅列举两个领域的深化改革情况。

第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全面深化改革成就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从整体上消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如影随形的贫困。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改善人民生活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出发点之一。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发展，中国人民大幅改善了生活，同时仍有部分群体没有摆脱贫困。为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2015年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习近平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通过排查贫困地区、帮扶贫困地区、建设特色产业等方式，到2020年底，全国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2021年2月，中国宣布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并挂牌成立国务院直属国家乡村振兴局，在衔接脱贫攻坚的同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乡村振兴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生态环境问题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2005年习近平就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一方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了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另一方面在环境保护制度上，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2016年，党中央决定全面施行河湖长制，层层压实治理责任，有效改善了国内河流湖泊的生态治理情况。十九届三中全会后，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等一系列国务院单位重新组建生态环境部，整合相关职能，更好地实现生态安全、环境保护目标。近年来，人民群众能够明显感受到空气质量的持续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年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总体完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实现了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1~54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513页。

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中国经济走上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改革又一次被摆在国家的突出位置,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经济改革方面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不仅在经贸、科技等方面采取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政策,并且制造南海问题等事端,意图从各个角度扼制中国发展。同时,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积累了一定风险,相关风险需要系统应对。除上述较为急迫的问题外,在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共同富裕等方面,中国也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来消除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机制问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24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为此,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七个“聚焦”、六个“坚持”和十四个方面的改革要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共包含15节60条,相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16节60条,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调整、重组各部分内容的同时,新增“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一节。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基本上在各个领域均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

就经济改革方面看,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从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做出部署。值得注意的是,第4节“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中第14个改革项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决定》全篇字数最多的改革项目。从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与主要方法,到改进科研管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经费管理、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构建科技金融体制等各方面,该项目提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具体课题。与科技体制相关的经济改革及各方面改革,是二十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内容之一。

毫无疑问,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迈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指导性文献,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献,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学习、切实贯彻。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0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陈佳]